

震荡 与 冲突

周积明 等 著
郭莹

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中的思潮和社会



商务印书馆

震 荡 与 冲 突

——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中的思潮和社会

周积明 郭 莹 等著

商 德 中 书 馆

2003 年 ·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震荡与冲突: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中的思潮和社会/
周积明,郭莹等著.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ISBN 7-100-03986-X

I. 震… II. 周…郭… III. ①社会思潮—研究—中
国—近代②社会问题—研究—中国—近代
IV. D092.5②D691.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97783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ZHÈNDÀNGYŪCHONGTŪ

震 荡 与 冲 突

——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中的思潮和社会

周积明 郭 莹 等著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北 京 冠 中 印 刷 厂 印 刷

ISBN 7-100-03986-X/D·327

2003 年 12 月第 1 版

开本 880 × 1230 1/32

2003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张 13%

定价: 23.00 元

序

以英国工业革命为开端的现代化世界进程至今已跨过 200 多年。这是一个深刻影响人类命运的宏观社会变迁,也是一个充满剧烈震荡、矛盾和冲突的历史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生产不断变革,一切社会关系不停地动荡,永远不安定和变动”,“一切固定的古老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①

中国是一个“后发外生”型的现代化国家,强大的传统、落后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迟发展的效应、列强的掠夺,使中国早期现代化的进程中充满极其尖锐的矛盾,而创新与守旧、中央和地方、滞后与操切、激进与渐进,则是诸种冲突中尤为剧烈者。

—

现代化过程充满了政策创新和突破传统,这是现代化的活力所在。大卫·哈维曾生动描述现代化的这种革命性说:“现代性即使对它自身的过去也不尊重,更遑论对一切前现代化的社会秩序了。”然而,这种政策创新天然地要受到错综复杂的社会守旧势力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254 页。

2 震荡与冲突

和既得利益集团的抵制,从而激发剧烈的冲突。

围绕政策创新而发生的冲突首先源于政治文化的不同观念。洋务派和维新派虽然变革立场不同,但在变更旧制、追随世界大势上是别无二致的,然而,他们所有的具有政策创新意义的举措或建策,无论是“制洋器,造洋船”、修铁路,还是废八股、开议院,都要受到“直欲破坏列祖列宗之成法以乱天下”的詈骂和围攻。在坚守祖制不可变的同时,政治守旧派还有一个强有力的理论武器,此即倭仁及其同党所一再宣称的“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所有有利于生产力发展和促进物质生活改善的变革,都在他们的排斥之列,由此而使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如涉风涛”^①,举步维艰。李鸿章曾愤慨指出洋务运动遭遇的种种障碍说:“士大夫见外侮日迫,颇有发奋自强之意。然欲自强必先理财,而议者辄指为言利;欲自强必图振作,而议者辄斥为喜事;至稍涉洋务,则更有鄙夷不屑之见横亘胸中。”^②由此可见冲突的频仍。而变革派在冲突中的遇挫,往往对现代化变革的全局产生影响。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同治六年(1867年),奕訢奏请在同文馆增设天文算学馆,招收30岁以下的正途士人(秀才、举人、进士、翰林),这些人在天文算学馆学习三年后,将会得到“格外优保”的晋升机会。这一建议一旦推行,将会对中国传统教育制度和行政制度产生重大影响。但其结果是招来“汹汹朝议”。“京师各省士大夫聚党私议,约法阻拦,甚且以无稽谣言煽惑人心”。在强大的守旧势力的压迫下,敢于入馆学习的科甲人员寥寥无几。《同治六年

① 薛福成在致李鸿章信中便有“办理洋务,如涉风涛”之语。

②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六),第149页。

三月廿七日通政使于凌辰折》谈到当时情况说：“或一省中并无一二人愿报考者，或一省中仅有一二人愿报考者。一有其人，遂为同乡、同列之不齿。”结局十分惨淡。梁启超后来回顾此事的意义和影响说：“其时正当日本遣人出洋学习之时”，“此议若行，中学与西学不致划为两途，而正途出身之士大夫，莫不研心此间以待用”。更重要的是，同文馆事件后 30 年，“向以所谓编修及五品以下官”，都已位居政府高职，如果他们当初在同文馆中接受了新思想、新知识，那么，他们就会成为现代化推进者的中坚力量，“用以更新百度，力图富强，西方大国犹将畏之，而况于区区之日本乎？”^①然而，扼腕之叹与无限感慨已无法挽回历史的遗憾。

因政治创新而引起的冲突还缘起于既得利益集团的抵制。洋务运动因为以引进西方器物文化为主要内容，对既得利益集团不太构成直接威胁，因此，洋务派和反洋务派之间的冲突，多是基于观念和意识的不同立场。戊戌变法在洋务运动的基础上把变革推向传统政治制度层面，由此引发的冲突不仅是观念上的，而且还有既得利益集团的抵抗。康有为关于“开制度局于内廷”的建策便激起“朝论哗然，谓此局一开，百官皆坐废矣”。^②军机大臣更愤然表示：“开制度局是废我军机也，我宁作旨而已，必不可开。”^③其结果是：“康有为正月所上请开制度局及增置十二局上疏，交总局议复，虽五月犹未复”。“皇上震怒，促其即复。至是复上，尽行驳斥”；梁启超等联合举人百余人，连署上书，请废八股取士之制。“当时会试举人集犖轂下将及万人，皆与八股性命相依，闻梁启超等此举，

① 梁启超：《变法通议》，《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

② 胡思敏：《戊戌履霜录》，《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四），第 153 页。

③ 《康南海自编年谱》，《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四），第 153 页。

嫉之如不共戴天之仇，遍播谣言，几被殴击”；岑春煊上书请大裁冗员，光绪允其所请。“此诏一下，于是前者尸位素禄闾无无能妄自尊大之人，多失其所恃，人心皇皇，更有与维新诸臣不两立之势”^①；光绪下诏，“将天下淫祠悉改为学堂，于是奸僧恶巫，咸怀恚怨，……交通内监，行浸润之潜于西后，谓皇上已从西教”。面对如此强大的反对力量，戊戌维新的夭折几乎是必然之势。

因利益被触犯起而反对变革的并非仅仅是官僚。苏继祖的《清廷戊戌朝政变记》记叙说：京师前三门外，“粪土载道，秽污山积，风即扬尘，雨即泥泞，春夏之交，变成瘟疫。……洋人目之为猪圈，外省比之为厕屋”。为了整治环境卫生，光绪下令，大清门、正阳门外的菜蔬鸡鱼摊肆，一概逐往城根摆设。“于是官吏闾民，皆称不便，官吏怙恩百姓，联名呈恳体恤”。双方站到了同一反对派立场上。新政期间，清政府厉行禁烟，“云南的罂粟种植者们立即投向叛民，当革命运动正在展开时，重新种植罂粟”。^②梁启超在戊戌政变后十分感慨地说：“除旧弊一事，最易犯众忌而触众怒，故全躯保位惜名之人每不肯为之。”^③这确是历尽劫难后的甘苦之言。

因政策创新而引起的社会冲突有时甚至与观念、利益无涉，而源于变革时期特有的紧张社会心理。如晚清新政中，当局为准备推行宪政，进行户口调查，但民众以为要藉此抽丁当兵或按人勒

① 陈夔龙在《梦焦亭杂记》中也记叙说：“戊戌政变，首在裁官，京师闲散衙门被裁者不下十数处，连带关系因之失职失业者将及万人，朝野震骇，颇有民不聊生之感。”

② 高第：《中国通史》第4卷，转引自《外国资产阶级怎样看待中国历史的》，第2卷，商务印书馆1961年，第204页。

③ 梁启超：《戊戌政变记》，《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一。

税，浙江湖州长兴县一带甚至流言政府调查户口是要将这些入卖与洋人作海塘打桩之用，若不从速收回，被调查之人必将死尽，于是人心惶惶。各地都有殴打调查员，捣毁其房屋，乘机纠众滋事，抢劫学校、店家的事件发生。宣统年间，上海川沙推行地方自治，民众骚动不安，反对新政情绪强烈。有人询问反对新政的原因，答曰：新政苦吾民也。如果进一步追问：何事、何物苦民？皆瞠目不能对。^① 这些非理性情绪的风起云涌，对于改革的推行阻碍极大。

二

晚清政治的一大特点是国家权力严重软化。乾隆朝以降的君主可谓一蟹不如一蟹。道光颀颀无知，虚骄自大；咸丰外刚内弱，好色多欲；同治幼承帝统，短命而夭；光绪 4 岁即位，纯属摆设。以母后临朝历时将近 50 年的慈禧则狭隘短识，恣睢暴戾，绝无近代政治的眼光。“当统治集团日益腐朽，政府的职能在上层首先废弛时，官僚组织的运行也在规模和质量上随之萎缩。”中央政府对地方的控制力日益削弱。

在财政上，清廷本来就因为巨额军费与战争赔款而“财源日竭”，亟需各省输血。但咸同以降，由于督抚专权的格局形成，^② “无论田赋、盐茶，一切征榷悉归地方督抚”。^③ 再加各地官吏的贪污、截留，地方士绅因参与捐税的征收而“借以牟利”，以致“税金不

① 方鸿恺、陆炳麟修：《川沙县志》，同光书馆，1936 年。

② 晚清督抚权力实际上有一个变化过程，“同治以前督抚权重”，同光之际转趋于轻，光绪二十三、二十四年后再度扩张。

③ 刘锦藻：《清朝续文献通考》，卷 68，国用六。

能入库”。光绪年间，清廷征收的正杂赋额名义上虽增至每年3400余万两，实际征收的却只有145万两。亏额大率为地方所侵蚀。美国学者杜赞奇在《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一书中指出：在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中，“国家对乡村社会的控制能力低于其对乡村社会的榨取能力”。“国家财政每增加一分，都伴随着非正式机构收入的增加，而国家对这些机构缺乏控制力”。^①杜赞奇把这一现象称之为“国家政权的内卷化”。内卷化的加深，通常意味着社会的进一步被压榨和破产，由此造成激烈的社会矛盾和冲突自是必然。

由于中央政权的软弱和地方势力的强悍，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中的“如何筹款，如何练兵，如何开军械局，如何开银行，如何铸钱币，皆听各省督抚之各自为谋，为者听之，不为者亦听之”。^②中央失控的局面虽然为各地大员在地方创办洋务企业提供了契机，但也使初起的工业化呈现为一种“畛域攸分”、“各行其是”的状态，缺乏统一的部署与组织。对于晚清工业化进程中的这一弊端，李鸿章早有觉察，他在致刘仲良的信中指出：

津、沪机器局巨费，在各国视若毫芒。近日粤、山左、湖南踵行之，各沾沾自喜，坐井而不知天大。莫如归并一局，分济各省，或可扩充，以抵西洋之一小局。愈分愈多，则愈不足以成事。^③

同治十三年(1874年)十月，福建巡抚王凯泰条陈海防事宜，

① 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第66—67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② 康有为：《康南海官制议》卷6。

③ 《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17，《复刘仲良中丞》（光绪二年五月十九日）。

也提出练兵、简器、造船，必须统筹全国财力，量入为出，通盘计划。奏折中说：

往日用兵，但就一处而言，此次海防须统天下财力而言；往日用兵，但就一时而言，此次海防则须统永远财力而言。量入而出，治国常经，治军尤甚。臣愚以为开办之初，允宜将此项海防经费通盘计划，何省可以拨用若干项，何项可以筹备若干，务在核定确数，然后就我力之所及，以之练兵、简器、造船。始事规模，不宜过宽，但期我力有余，自可随时恢扩。如是而内外一心，实事求是，坚贞若定，卓立不摇，夫然后可以持久，夫而后可谓自强。^①

李鸿章与王凯泰之论，实际上已揭示出中国早期现代化过程中“社会动员”的紧迫性。所谓“社会动员”，其含义正如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在《后工业化社会的来临》一书中所诠释：“一个动员起来的社会是这样的社会，国内的重要资源都集中在由政府确定的特定项目上。在这些部门里，私人需要实际上从属于业已动员起来的项目。”日本之所以迅速在现代化过程中崛起并于昭和年代实现工业高速发展的“工业强行军”，重要的原因之一是政府进行了有效的“社会动员”。前苏联为了使新生的、惟一的社会主义国家在世界资本主义的包围下生存下来，为了应付可能爆发战争的险恶国际环境，充分调动经济权力，用农业集体化、“剪刀差”和低消费、高积累的政策，强行从农业和大众消费中获取资金来支持其五年计划。短短10年之内，苏联的工业经济便赶上和超过了老牌帝国主义国家，位居欧洲第一、世界第二。由此可见“社会动

① 《月折档》同治十三年十月二十五日，福建巡抚王凯泰奏。

员”对后发国家现代化的重要意义。然而,面对王凯泰建议的“统天下之财力”和“通盘计划”,清廷却是无能为力。其典型事例可见于围绕江南制造局搬迁而发生的争论。

光绪二十一年,张之洞提出,江南制造局离海太近,容易受到外国海军的攻击与封锁,从战略上着眼应迁往位于内地的湖南。光绪二十三年,兵部尚书荣禄奏请将中国军工企业的地点重新加以调整,布局重心在产煤、铁丰富的山西、河南、四川和湖南,而不在沿海。他和张之洞的思路相似,亦认为江南制造局应迁往湖南的产煤、铁之地。但清廷的意图受到江南制造局的强烈反对。沪局总办刘麒祥列举诸多理由,论证江南制造局的不可搬迁,如沪局地处交通方便之处,向沿海及沿江运送军火方便,向国外购买原料亦方便;沪局在上海可以雇到技术纯熟的工人;机器搬迁困难并耗资巨大。其实,江南制造局不愿搬迁的最大原因是地方大吏自张势力的需要。江南制造局在江苏,不仅使江苏省可据此分配到大量关税,而且也可大大提高江苏省的地位。

张之洞与荣禄调整军工企业布局的建议虽因地方势力的反对而一时搁浅,但类似设想又在新政期间提出。新政时成立的陆军部雄心勃勃,欲以6年时间建立5个由中央直属的兵工厂:即广州机器局、四川机器局、汉阳枪炮厂、德州兵工厂,同时把沪、宁二局合为一厂,所需经费300万两由沪局的紧缩项下筹措,其中一半用于德州兵工厂。然而,这一规划再次因江南制造局的强烈反对而搁置。辛亥革命前夕,陆军部对前此提出的方案进行调整,拟将所有的兵工厂均收为中央所有,并继续发展江南制造局,试图在加强中央控制的同时减轻江南制造局的愤怒和反抗,但清政府旋即被

推翻，一切计划都化成泡影。^①

当然，清廷面对地方势力的抗命和挑战并非一无作为。晚清新政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恢复和加强中央政权的力量和权威，为此将最具实力的封疆大臣袁世凯和张之洞调入中央任军机大臣，削弱他们在地方上的权力。^②与此同时，清廷相继将各省的财政、盐政、路矿经营等权统一收归中央。问题是自戊戌维新和东南互保以来士绅和督抚已形成一股强大的地方分权势力，清廷的集权动作势必与他们发生激烈冲突；度支部裁泽的免厘加税和盐政措施使地方官绅有钱财被夺之感；农工商部和邮传部将各省兴办的新式事业纳入中央管辖的范围更被视为对地方利益的侵害。“事关本省权利存废”^③故不得不争，各省与中央的对抗趋于白热化。光绪二十八年闽人为反对清廷批准大东公司承采福建境内的矿产而发布公告，声言“楚弓必归楚得，人谋不若己谋”，“吾辈怀桑梓之乡，守祖宗之土，鹰鹯必逐”，强烈的地方主义溢于言表。宣统二年九月，浙江省谘议局为反对清廷对浙江铁路的逾越处治，以“停议待旨”的方式，公然向中央抗争。风起云涌并直接促成武昌起义的保路运动更表现了川、鄂、湘、粤地方势力与清廷中央利益的冲突。所谓国有、民有之争，实际上在相当程度上是中央与地方督抚的经济主权之争，也是中央与地方士绅之间的切身利益之争。民

① 参见 Thomas L. Kennedy, “The Kiangnan Arsenal in the Era of Reform, 1895—1911”, 台湾中央研究院近史所集刊, 第三期; 同时参见张玉法:《清末民初的官办工业》,《清季自强运动研讨会论文集》(下册)。

② 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已有舆论强调集权于中央。如《江西提学使汤寿潜奏稿》:“今欲救中国之急,惟有收督抚之权,而集于中央。”

③ 《浙路总理汤寿潜革职后续闻》,《东方杂志》第七年第10期,“中国大事记补遗”。

国元年一月三十日的《民立报》曾尖锐分析辛亥革命中地方主义的利益动机：“故有利之事此争彼夺，不得则宁举共和而破坏之，其乐于自相为治者，正以利之所在，无遑谦让也。”以往讨论辛亥革命的发生，往往立足于阶级斗争论，而忽略了事实上的中央与地方的利益之争，而研究中国早期现代化的进程，不能不顾及这一十分重要的冲突和矛盾。

世界现代化进程的历史经验表明：后发国家的现代化由于不是自身内部的现代性逐益积累成熟的结果，因此，在整个现代化的过程中，必然充满远比早发国家更为激烈、动荡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只有建立一个具有现代取向而又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才能通过国家机器的力量，将十分有限的现代化基础条件动员和集中起来，以用于现代化的最关键环节，并有效地解决现代化进程中因社会变革而发生的动荡与衰朽。曾因“文明冲突论”而引起中国学者注目的塞缪尔·P. 亨廷顿因此断言：在后发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强大的政府比经济优先发展更为重要。^①然而，这一问题在中国长期未得到解决。中国早期现代化之所以步履艰难、震荡剧烈，无疑与“长久的政治软弱履历”^②有着密切的关联。

三

康罗在《多国比较分析》中曾用下述的一段话来描述“一个动荡国家的大体轮廓”：

① 参见亨廷顿：《变动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三联书店，1989年7月版。

② 罗兹曼在《中国的现代化》中指出：“在现代史上，像中国这样一个具有长久的政治软弱履历的大国，实属罕见。”

在现代性面前感到眼花缭乱；社会的传统生活方式四分五裂；整个国家面临着经济、社会、政治各方面的要求改弦更张的压力；……现代化进程中的变革一般来说已使大家牢骚满腹，而政府未能满足群众日益提高的期待，尤其使百姓怨声载道。^①

在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中，因变革速率无法满足社会的政治期待而发生剧烈冲突，以晚清新政时期最为典型。

晚清新政虽然是一场王朝自我挽救的变革运动，但在中国早期现代化的进程中却占有十分重要的一页。正是在新政期间，传统中国社会的诸多领域发生了一系列变革，并产生了深刻效应：官制改革在客观上推动了国家体制的现代化；教育改革奠定了中国现代教育的基础；军事改革推进了中国军事的现代化；法律改革开了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先河；奖励实业直接促成了创办实业的高潮。这些实绩所构造的宏伟场景为洋务运动和百日维新所无法企及。更为重要的是，清政府终于宣布“仿行立宪”，从而触动了传统政治体制中的最保守成分。

然而，清末新政毕竟是一场来得太晚的改革，由此而使清政府面临着极为不利的条件。就国际环境而言，由于近邻日本和俄国相继进行了政治体制改革，实行立宪政治，给国内提供了强烈的示范效应，随着时间推移，这种效应和影响急剧加大；在国内，自戊戌时期开始发展起来的立宪意识急速生长，当清政府决议“仿行立宪”，立宪派“奔走相庆，破涕为笑”，“额手相庆曰：中国立宪矣，立

^① 转引自亨廷顿：《变动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三联书店，1989年7月版。

宪矣，转弱为强，萌芽于此。”^①由此可见立宪意愿的极其强烈。在这样一种高涨的社会情绪和政治期待下，清政府的任何滞后表现都必然导致激烈的矛盾和冲突。

事情的演化偏偏如此。面对新政时期强大的立宪舆论和急迫的立宪要求，清政府拿出的方案却是以9年为期，平稳地有步骤地实现君主立宪。这一日程表当然使立宪派大失所望。他们认为9年太长，要求1年召开国会，并为此发起4次“速开国会”的请愿活动，其规模遍及16个省，参与签名者达20万人，从而极大地导致了整个社会的震荡以及社会矛盾的尖锐化。请愿运动的最后失败，直接导致了立宪派与清政府的分道扬镳。“至庚戌辛亥时，即立宪之报纸，悉已一折而入于革命运动。此则清廷存亡绝续之大关键”。^②

应该承认的是，清政府实现君主立宪的方案虽然时间拉得太长，但却是一条支付较小社会成本、实现政治平稳过渡的道路。新政以及预备立宪期间清政府所取得的改革成效，《逐年筹备事宜清单》对立宪步骤的细致规划，都显示了这一前景的实现不无可能。但是，面对中国社会的急骤转型，这样一套方案又显得是这样的滞后和不合时宜，由此而使“海内人民，始而发愤，继而失望，终而怨望，乃不惜铤而走险，泄其不平，以身试法，无所顾虑”。^③清政府因而陷入极为被动的局面，并最终付出沉重的代价。

与上述情形形成反观照的是，变革过于激进操切，超过了社会

① 《论报馆恭祝立宪》，《申报》1906年9月16日。

② 戈公振在《中国报学史》中所引“上海闲话”之评语。

③ 《湖南即用知县范輿等请速设民选议院呈》，《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下），第609页。

的承受力,同样也将激化矛盾,导致“现代化受挫”(Breakdown)。其典型的例子是戊戌变法。

戊戌变法的发生有四个大的背景:一是中国在甲午战争中遭受奇惨大痛,面临着“种族沦亡”的紧迫危机;二是近邻日本的现代化变革对中国的现代化推进者产生了强烈的刺激和示范效应;^①三是甲午战败使洋务运动成为众矢之的,而对“中体西用”洋务纲领的否定与清算,意味着维新派必将走得更远;四是知识分子的政治参与意识空前高涨。这一时期,“学会之风遍天下,一年之间,设会数百”。“各省从风,州县并起,不可指数”。报纸的发行也呈风起云涌之势,仅光绪二十一年到二十四年间,便出现了约 60 种报纸,“各省之风气于兹大变”。与此同时,出现了康有为布衣上书^②和十八省举人联名请愿的重要政治事件,由此显示了知识分子政治参与的强烈要求。

积极要求参与政治变革并最终进入决策中枢的维新派是现代化的热烈鼓吹者和推动者,同时又最富于浪漫气质和乌托邦理想。他们基于文化整体主义的立场,全面否定洋务派的“中体西用”纲领,进而提出“全变”的变革主张,如康有为指出:“若决欲变法,势当全变”,“全变则强,小变仍亡”^③,“旧法全除,宜用一刀两断之法”。^④梁启超也认为:若言变革,必须“全体并举,合力并作”。康、梁的代表性言论,决定了戊戌维新在改革的定位上具有“一揽

① 这一时期流行的口号是“近师日本,远摭欧墨”,可见其时社会情绪。参见拙作《近师日本,远摭欧墨》,《湖北大学学报》1998年第3期。

② 康有为《上清帝第一书》时尚是“南海布衣”,连上书的资格都不具备。

③ 康有为,《上清帝第六书》,《康有为政论集》上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11页。

④ 康有为,《日本政论考》。

子”解决和“毕其功于一役”的特点。与此同时，维新派中的激进成员走得更远，他们不仅力主“全变”，而且明确提出“全盘西化”的主张，如易鼐提出：“一切制度，悉从西则。”^①樊锥主张：“一革从前，搜索无剩，唯泰西是效。”^②大声疾呼“冲决罗网”的谭嗣同也有“尽变西法”之说^③。这样一种情绪势必会影响到维新派对中国国情与变革复杂性的审慎考虑。对于变革的前景，维新派也充满过于乐观和不切实际的估计：他们一心以为：“以皇上之圣，图自强在一反掌间耳。”只要全面采借日本的经验，“三年而宏规成，五年而条理备，八年而成效举，十年而霸图定矣。”^④

正是基于如上操切急躁的变革心态与过高的政治期望，维新派以“一日千里之势”揭开了百日维新的序幕，“百日之间，维新之诏，联翩而下”。海关税务司的赫德形象比喻当时的情形是“把足够几年吃的东西不顾它的胃量和消化能力，在三个月之内，都填塞给它吃了”，^⑤其结果必然是全面触动与传统势力和既得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与此同时，维新派又表现出一种轻慢浅浮的品性。如康有为奏请成立制度局，外界本猜疑紧张，可维新派中少年得意者却偏还要大肆议论，说某官可裁，某官宜去，已奏请皇上飭办，即日便有圣旨下达云云。康有为的一弟子更把刘坤一、李鸿章称为“顽固老臣”，声言过不了几天就有圣旨将他们斩首。如此做派，当然只会使空气更加紧张，形势更为复杂化。而维新派密谋捕杀慈

① 易鼐：《中国宜以弱为强说》，《湘报类纂论著》甲上，第18页。

② 樊锥：《开诚篇》。

③ 谭嗣同：《报贝元徵》。

④ 康有为：《进呈日本明治变政考序》，《康有为政论集》上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24页。

⑤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3卷，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第168页。